

第一章 金田起义

●火起广西

黔江和浔江是广西地区的两大河流。黔江和郁江合流处的桂平以及浔江北岸的平南等地的山区，是太平天国的摇篮。一百四十多年前，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怀着对清政府黑暗统治的满腔怒火，在这里点燃了反清的熊熊烈火。

鸦片战争后，全国各地的阶级矛盾普遍激化。广西是矛盾最尖锐的省区之一。

广西位于我国的西南边陲，境内多山岭、丘陵，石灰岩地质构造分布普遍，属于石多田少、资源缺乏、自然条件恶劣的落后地区。

然而，就在这穷山恶水之地，封建剥削非常苛重，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形十分惊人。广西博物馆内保存着一批道光年间贵县一罗姓地主购买田地的契

约。契约表明，罗家从 1833 年到 1850 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先后兼并了贵县龙山一带的几十个村庄，包括田地、山林、竹园、鱼塘、宅基等在内的整片土地，方圆数十里，每年收租达十八万担。

清朝初年，广西几经战火，人口锐减。乾嘉年间，清政府大量招收外省劳力入境垦荒。福建、广东、湖南等省相对过剩的人口因此纷纷迁居广西。广西的人口迅速增加，大大超过了全国人口平均增长率，土地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

拥有土地的地主对租种土地的农民苛以重租。金田等地的地租最高达到收获的六成，甚至七成。农民交了地租，屋里的粮食所剩无几，很难养家糊口。稻谷满仓者，不是种田人。

农民除了向地主交租，还有交不完的官税。旧税还未交完，新税又出现了。层层官吏，巧立名目，不择手段地勒索百姓，人民痛恨地称之为“蝗虫”。供板”便是官吏对付百姓的恶毒手段之一。所谓“供板”就是贪官任意捉住一人，一番严刑拷打之后，花言巧语唆使其指控某人为盗匪，然后将该人捉拿下狱，进行勒索。被勒索者，轻的，私下送钱疏通；重的，倾家荡产。

贪官必然昏庸，庸政必然腐败。这些百姓的“父母官”们考虑的是如何从自己的子民身上多搜刮一些钱财，无心过问政事，更无心去关心百姓的冷暖。

有些官吏为了大发横财，与盗匪勾结，官道黑道不分，鱼肉百姓。这样的官吏治理地方，百姓怎能生活下去？

除了人祸，还有天灾。

鸦片战争前后，广西自然灾害不断，仅以道光年间桂平等几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水灾 7 次，旱灾 14 次，风灾 6 次，蝗虫 18 次，雹灾 5 次。这对靠天靠地吃饭的农民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事实上，天灾和人祸同时而来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正是由于政治的腐败，官吏的昏庸，使水利失修，虫灾没有得到及时的预防，水灾、旱灾、蝗灾才会接踵而至。

农民无法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了。不少农民无限眷恋地离开了养育自己多年的故土，流落他乡，成为流民，并和其他省区的背井离乡者一起汇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流民大军。

自古以来，流民一般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城镇。当时长江流域的上海、武汉，两湖流域的长沙，西江上的广州、肇庆、梧州等城市，都是流民的集结之地。

流民到达一地后，为了能在异地站稳脚跟，并使基本生活有所保障，往往拉帮结派，成立帮会。道光年间，帮派之风盛行，形成了北方以白莲教为中心，南方以天地会为中心的两大帮会体系。一时间，全国

山堂林立，会旗飘舞。而广东和广西两省是天地会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天地会这个秘密组织早在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间就产生了，主要在福建、两广、湖南等地秘密蔓延。它的名称变化较多，它自称为“洪门”，在有些地区又称为“三点会”或“三合会”。以后，天地会蔓延到更多的地区，形成了“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上海等地的“清帮”等不同的帮会组织。天地会的组织形式是所谓的“山堂”，每个山堂有自己的头目，称为“大哥”。参加天地会就是参加某个山堂。在江湖上有一定资历和号召力的，就可以自立为头目，建立山堂。不同山堂的人在江湖上相遇时，可以用他们中间特有的隐语和暗语打招呼，有互相帮助的义务。

天地会的基本群众和它的领导者主要是江湖游民。他们依靠这种组织来争取生存空间，对抗官府的压迫。他们也利用这个组织起来造封建统治者的反，所以，清政府一贯严格禁止天地会。

鸦片战争以后，形势变化剧烈，广西游民日增，天地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个武装起义的高潮正在酝酿之中。

在天地会的组织领导下，广西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有名号的起义队伍就达一百多支，每支队伍少则数十人，多的达万人以上。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几十支规模较大的队伍，他们攻城略

地，杀富济贫，影响很大。著名的会党首领有 柳州的陈亚贵，武宣的梁亚九，象州的区振祖，浔州的谢汇殿，金州的李世德，庆远的张家福。

外国侵略势力入侵后，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省的大批失业游民也纷纷进入广西，其中湖南的雷再浩与李沅发、广东的李永酬等人都相继转移到这一“天高皇帝远”的地区继续开展斗争，使广西原有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天地会尽管各个山堂相互独立，没有隶属关系，缺乏统一的组织，但其在广西的斗争持续了几十年，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名号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个，活动地盘不断扩展，极大地牵制了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力量，客观上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起到了掩护的作用。

面对日益高涨的反抗运动，广西巡抚郑祖琛采取了敷衍放任的态度。这绝不是他同情、支持农民斗争，而是无力镇压，无可奈何，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粉饰太平，以求平安无事。但他又不敢如实上报朝廷，生怕受到责难，丢了乌纱帽。

清朝当局的敷衍放任政策是广西特殊形势下的产物。它充分表明，广西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统治阶级已无力镇压普遍的、频繁的人民反抗运动。显然，敷衍政策只是自欺欺人，不能挽救广西的危局。相反，它给天地会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

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秀才造反

在广西会众发动反清斗争的时候，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在酝酿之中。

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十日（1841 年 1 月 1 日），广东花县农民洪镜扬又添一子，取名仁坤。父母认为孩子“命中缺火”，故取“火秀”为乳名。他就是后来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

洪秀全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勤劳朴实的种田人。他出生后不久，全家便由花县县城以北的福沅水村搬到了县城西南方向的官禄埗村，这个村子南距广州城不到一百里。

广东地区水网密布，气候温和，农业繁荣，自古以来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一般人或许以为这里的人民缺乏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

事实上，鸦片战争前后，广东一带是最先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略的地区，因而也是我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化和反封建反侵略斗争开始得比较早的一个地区。1841 年 5 月，当英国侵略者认定清朝官兵无抵抗能力的时候，却在广州北郊的三元里遇到了他们所没有料到的劲敌，结果丢盔弃甲，溃

不成军，狼狈而退。这就是著名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这一斗争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先河。洪秀全便是在这块中国近代革命发源地慢慢成长起来的。

洪秀全，这个农民的儿子，又是怎样走上造反之路的呢？

纵观洪秀全早期的生活道路，他和一般传统知识分子所走的路是一样的。他 7 岁开始进入私塾读书，无非是读些《四书》、《五经》之类的封建社会传统经典。但他是一个十分聪明、勤奋、好学的孩子，除了这些传统经典之外，他还自学了中国历史以及那些在当时看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奇异书籍”。这不仅使他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而且使他的思想不受传统教条的束缚。

洪家人多田少，生活拮据，供他上学显得有些吃力，常常要靠亲友的资助，才能勉强继续下去。大约读到 16 岁的时候，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在家帮助父兄种田，有时还到山野放牛。

他的才学和为人很受族人和朋友的赏识，因而 18 岁时，他被聘为本村私塾老师，成了“孩子王”。

这样一个在乡村中土生土长的农民知识分子，原先并没有想到要造清王朝的反。他和当时的读书人一样，受到“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做着通过“科举”考试去做官的“美梦”。他以为凭着自己的真

才实学 就会取得“功名”受到朝廷的重用。

然而，在科举的道路上，迎接他的并非金榜题名、衣锦还乡 而是一连串的失败和打击。他从 16 岁起，曾先后数次去广州参加考试，结果都是名落孙山。屡试不第，使一心只想走科举之路的洪秀全颇感受挫，心灵烙下了巨大的伤痕。道光十七年（1837 年）的春天，洪秀全第三次赴广州应试。初试自我感觉良好，然而张榜公布那天，他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现实让他心灰意冷 深感前途无望 悲愤异常，终于大病一场，卧床不起。

碰壁固然在精神上折磨着他，但碰壁的痛苦促使他面对冷酷的社会现实，重新考虑以后的生活道路。就在他陷入悲观绝望之际，两位相同命运者走进了他的生活：一位是比他年幼 9 岁的族弟洪仁玕，一位是家距官禄 墟村仅 3 里的禾落地村的表弟、同窗学友冯云山。他们也都是屡次参加府试的落第者，相同的命运把他们的思想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如同当年桃园三结义的兄弟一样，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谈论时弊，发表自己的政见。他们反思屡试不第的原因 是自己才疏学浅 还是“文星不照”是自家祖坟风水不好，还是自己前世没有修好德行？不，都不是！他们终于悟出了根源：是腐败的科举制度在坑害人。

由此及彼，洪秀全又在思索：为什么反剥削、反

压迫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由于几次赴广州考试，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新鲜事物，洪秀全扩大了眼界，丰富了社会知识。他看到了清廷的反动统治、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农民的反抗运动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并逐渐萌发了救广大农民于水火之中，改造现实社会的思想。他毅然抛弃了“科举”考试，走上了造反的征途，成为一个旧世界的勇敢叛逆者。

●拜上帝会

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要造清廷的反，首先必须发动群众。用什么办法把广大群众发动、组织起来呢？

由于熟读《四书》、《五经》精通古代历史 洪秀全知道，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特征的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家族的观念相当浓厚；由于从事过农业劳动，长期接触群众，洪秀全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阶级的愿望和要求，有着较深刻的了解，深知要将分散的农民聚集起来，发动他们为改变自身的命运而斗争，只有借助宗教的力量，才会给他们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利用宗教动员、组织农民起来反抗的例子屡见不鲜。以史为镜，洪秀全决

心利用宗教来统一农民的思想，将松散的农民组织成一个富有战斗力的集体。比较奇特的是，他所利用的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佛教、道教，而是一般中国人不了解的基督教，因为现行的宗教不过是统治阶级愚弄、统治、压迫人民的工具。

洪秀全接触到这一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1837 年他第二次到广州参加考试时，恰逢一位名叫梁发的基督教徒在街头向过路人散发宗教书籍。洪秀全也得到一部，书名叫《劝世良言》。当时的洪秀全对于这种无益于功名的传道书并没有产生任何兴趣，只是随便翻阅了一下目录，便扔到书柜中去了。第二年，他得了一场重病，四十多天卧床不起，严重的时候甚至神志模糊，不省人事，脑子里尽是一些光怪陆离的幻想。

关于这场大病，在后来他编写的史书《太平天日》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书中写道，洪秀全病重时，感到曾被天使接到了天堂，一位高踞宝座的老人向他指出了妖魔迷惑世人的情形，并将一名字赐给他，叫“天王大道君王全”，凡名洪秀全；还赐给一柄宝剑、一方大印，命令他回到人间斩除鬼魔，制服邪神。并且再三告诫他，宝剑只许斩除妖魔鬼怪，不得妄杀兄弟姐妹。在天上逗留期间，他还遇到过一位帮助他诛灭妖魔的中年人。这个洪秀全升天异梦的故事，听起来似乎很有趣，甚至荒诞可笑，但只要仔细

推敲，不难发现是后来编造而成的。尽管故事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透过这层色彩，折射出的则是浓浓的反清思想。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年逾三十的洪秀全最后一次赴广州应试。而立之年，尚未能取得功名，立足社会，其心情是十分压抑的。这次考试失败后，洪秀全来到了距家三十多里的莲花塘李家塾中教书。盛夏时节，表兄李敬芳到他馆中闲谈，偶见其有《劝世良言》一书，即借回详读。在李敬芳的推荐下，洪秀全利用课余时间仔细阅读了这部被搁置多年的书籍，不想爱不释手，废寝忘食。

这是一部比较粗糙、浅陋的传道书。作者梁发，广东高明县人。他在帮助传教士马礼逊刻印汉文《圣经》时，见其所译《圣经》太差，难以被中国人所接受，于是根据《圣经》内容加入了一些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观念，编成《劝世良言》一书。该书摘引了《圣经》中的某些片段，反复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崇拜偶像、邪神，宣扬天堂永远快乐，地狱永远痛苦等教义。洪秀全在完整地阅读之后，以他当时的遭遇和心境，与书中所宣传的平等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洪秀全接受了《劝世良言》中关于上天只有一位真神的观念，即“上帝爷火华（即耶和华——引者注）”。他用这种思想观念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认为上帝是惟一的真神，其他都是妖魔。人间的封建统治者

擅自僭用‘皇’和‘帝’的称号是一种妄自尊大、不知天高地厚的表现，应被视作妖魔而打倒。

洪秀全把《劝世良言》和他的异梦互相印证时，发现他所见的天上老人就是天父上帝；那位中年人是天父的长子——救世主耶稣。天父上帝派他下凡斩杀妖魔，《劝世良言》即是上帝赐给他的天书。洪秀全顿时感到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他把《劝世良言》介绍给冯云山和洪仁玕阅读，并对如何恢复世间应有的平等和铲除那些不平等现象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他们认为首先应该宣传拜上帝，使上帝的平等思想深入人心，唤醒人们起来为争取平等而斗争。于是，洪秀全开始了宣传拜上帝、创立拜上帝会的最初活动。

1843年，洪秀全利用基督教的组织形式，创立了“拜上帝会”。这一组织以宣传拜上帝教为己任。它所宣传的拜上帝教有以下几个特色：第一，这个宗教宣布说只有‘上帝’是真神，其他被大家所崇拜的对象都是妖魔。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这种思想使农民在精神上获得极大的解放。既然孔夫子、阎罗王、菩萨、龙王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精神势力不过是妖魔，那么，农民为什么不可站在上帝的一边同站在妖魔一边的人作战呢？既然一切人都是拥有平等权利的上帝子女，那么，为什么农民不该起来打破封建等级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天国”？

呢？第二，这个宗教宣传的一神论思想，有利于把习惯于散漫生活的农民组织成统一的整体。第三，这个宗教要求严格的道德生活，绝对禁止奸淫、妄杀、贪财、赌博、吸食鸦片和酗酒。

当然，洪秀全对于基督教的历史、教规、教义知之甚少，他只是利用基督教这一宗教形式来宣传平等思想。他的“上帝”并不就是那些传教士心中的“上帝”。当时的群众还深受宗教迷信的影响，农民反剥削反压迫的革命要求，便披着宗教外衣而表现出来。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借用了基督教中的一些传说、故事和语言，它和西方本来意义上的基督教又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在当时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根据群众运动和群众思想水平所能找到的一个较好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方式。

拜上帝会创立后，冯云山、洪仁玕首先入教，成为洪秀全的忠实追随者。

既然新教只拜天父上帝，就必须废除对孔子的崇拜。联想到屡试不第的痛苦经历，洪秀全等落第秀才对孔子这位“大成至圣先师”可以说是恨之入骨。1843年7月，洪秀全愤怒地将自己私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打翻在地，又除去了表兄李敬芳家供奉的牌位，稍解了落第之恨。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孔子尊为“圣人”，以孔子的学说作为维护统治的舆论工具。洪秀全敢于冒犯孔子的尊严，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震

惊的行为。

为了证明他在 1837 年升天异梦中上帝确实赐给他一把“斩邪留正”的宝剑，洪秀全特地请一位有名的铁匠给他铸造了一把三尺长剑，上刻“斩妖剑”三字。

农历七月初七，私塾放假。洪秀全一回到家中，便开始宣传其所创新教。他邀请冯云山、洪仁玕到一个名叫“三堆石”的地方举行了入教仪式，再到石角潭按照基督教礼仪沐浴洗礼。洪秀全同族不少人也均受感化而接受洗礼，毁去家中的孔子牌位，参加了拜上帝会。

洪秀全不拜偶像、打翻孔子牌位的举动，使当地族人大为震惊，害怕教坏他们的子孙，不允许他继续执教，并对他严加监视。他宣传拜上帝教的活动也被指责为崇尚洋教洋人，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之举，因而不仅约束自己的子女不要听信他的说教，而且处处设置障碍，百般阻挠，真心实意追随洪秀全信仰拜上帝教的人寥寥无几。

塾师职位的丢失，使洪秀全无以为生；族人的百般阻挠，使他无法继续传教。双重压力之下，洪秀全、冯云山等决定离开花县，到外地宣传真道，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道光二十四年（1844 年）三月的一天，洪秀全偕冯云山、冯瑞嵩、冯瑞珍离开花县去外地传教。洪仁

环因为年轻，家人不允许其同行。为了筹集路费，他们沿途贩卖笔、砚台等物。

创业是艰难的。面对花县之外的茫茫天地，路在何方呢？洪秀全等人心中没底。一行四人首先在广东省内没有目的地漫游，先后到过广州、顺德、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曲江、阴山、连山等地。所到之处，他们热情宣传教义，寻找志同道合者。

洪秀全等人的热情依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于陌生的拜上帝教有着本能的抵触情绪，况且广东等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吸引这里的人民入教造反也有一定的难度。异教总是在那些不满于现实、又憧憬新教所构建的幸福蓝图的地方兴起。于是，洪秀全决心进入相对落后的广西地区。从广东到广西，洪秀全在背叛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出行天下，宣传拜上帝教，本身就是对体力和意志的双重磨练。冯瑞嵩、冯瑞珍两人在传教收效不大的情况下，因畏惧艰苦的长途跋涉，对前途丧失信心，中途折回花县。洪秀全、冯云山二人毫不动摇，继续西进。这之后，两人又先后到达过八排山、贵县赐谷村等地，虽然说服了许多人人教，但工作进展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洪秀全于是独自返回花县，冯云山则前往紫荆山区。

紫荆山区属于桂平县，由 18 座大山组成，其南

麓就是有名的金田村。这里交通不便，封闭落后，剥削严重，贫富悬殊很大，赤贫者对现实非常不满，极想改变自身的命运。无疑，这是传播拜上帝教的理想地区。

1844 年 11 月，冯云山首先到达紫荆山区的第一站——古林社。古林社是个仅有十余户人家的小山村，是紫荆山东面入口的必经之地。

冯云山初到此村，非常谨慎，假说是由广东进入广西，原想到柳州找叔叔，不想途中被盗，举目无亲，便在古林社暂住下来。

初到异乡，人地生疏，生活十分困难。冯云山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 拾牛粪 挑泥挖土 割禾打谷 烧砖做瓦 无论轻活重活 只要能够糊口 就抢着做。由于他为人忠厚，待人诚恳，深得贫苦兄弟的爱戴。

冯云山白天劳动，晚上住在牛栏，和当地的穷哥们谈古论今。在被当地人从感情上接受后，冯云山开始向他们宣传拜上帝思想，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他们听得心悦诚服。冯云山在古林社 3 个月 这个仅有十来户人家的小山庄，就有十来名贫苦农民信了拜上帝教，成绩十分喜人，这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初春 冯云山满怀期望地走进了紫荆山，经人介绍来到鹏隘山大冲村曾玉珍家做私塾先生。冯云山借着当塾师的机会，常到农

民中间进行宣传，劝导大家信奉上帝。说上帝是惟一的真神，人人都是上帝所生所养，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彼此应该平等。信了教，就可以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用，无人不饱暖。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的贫苦农民，从冯云山这里得到了慰藉，看到了希望，纷纷加入拜上帝会。

冯云山为人热情诚恳，口才很好，善作宣传鼓动工作，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冯大伯”，将其视为知心人，和他讲心里话。冯云山也很注重斗争的策略，他吸取了以前砸毁庙宇及孔子牌位引起乡人特别是当地传统势力百般刁难的教训，在洪秀全进紫荆山之前，没有采取直接捣毁偶像的做法，而是利用做苦工和教书作掩护，为革命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冯云山终于在紫荆山落下了脚。经过 3 年的苦心宣传，先后有三千多人聚集在他的周围。他还辛苦奔波于紫荆山—金田地区，使太平天国的第一个革命基地终于初具规模。冯云山艰苦创业的卓越功勋与这场伟大革命运动一样永垂史册。

这一时期发展的信徒，日后成了拜上帝会的骨干力量，其中包括杨秀清、萧朝贵等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人物。杨秀清是紫荆山平山人，从小失去父母，孤苦零丁。他由伯父抚养成人后，以烧炭为业，生活极为艰难。武宣人萧朝贵出身贫寒，其父因交不起地租，被迫逃到紫荆山区。杨、萧二人很快引起了冯